

孫科與1943-1946年的 憲政運動

• 張國鈞

在中國憲政史上，孫科是一個具有特殊影響的人物。這不僅是因為他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達16年之久，領導了國民政府訓政立法、戰時立法、行憲立法的全部過程。更重要的是，孫科是一個具有歐美民主思想，並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統治進行過若干次抗爭的人物。特別是在1943-1946年間，孫科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長的身分站在憲政運動的最前列，「要求黨內黨外都實行民主」^①，「儼然成為國民黨革命派領袖，博得各民主黨派及一切開明人士的好感」^②。美國報紙則直呼孫為「自由主義的立法院長」^③。本文擬對孫科1943-1946年間的言行作一番考察，從而探究這期間憲政運動的發展。

孫科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達16年之久，領導了國民政府訓政立法、戰時立法、行憲立法的全部過程。他是一個具有歐美民主思想，並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統治進行過若干次抗爭的人物。特別是在1943-1946年間，孫科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長的身分「要求黨內黨外都實行民主」。美國報紙直呼孫為「自由主義的立法院長」。

一 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推動成立聯合政府

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到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止，孫科出於某種政治考慮，一直堅持為國民黨一黨專政辯護的立場。針對當時輿論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的呼聲，孫科多次撰文予以批駁。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因應國際形勢的變化而宣布解散。中國共產黨隨即宣布接受共產國際解散的決議，並解除中國共產黨對於共產國際的一切義務。這一事件，在國民黨上層內產生了極大的影響。5月24日在國民政府召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與會者對於共產國際的解散，「群以為慰」^④。孫科且認為，隨着第三國際的解散，中國共產黨進行共產革命的國際背景已不復存在，「中國亦當從此與盟國謀接近，注重政治的民主化，即實行民權主義與言論自由」^⑤。從此，孫科一改抗戰以來為國民黨一黨專政辯護的論調，「不斷地到處演講，大寫文章，高喊不應當再維持一黨專政」^⑥。1944年5月5日，孫科在重慶主

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法西斯化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英美盟國均表示「不能諒解」，認為中國「離民主國家陣線日遠」。對此局面，孫科深感憂慮。他指出：「當今世界政治的思潮是民主自由，中國必須「與民主世界，同一步趨」。

辦《民主世界》月刊(年底改為半月刊)，自任理事長，由親信鍾天心任主編。在創刊號發表的〈編者的話〉中聲明：「民主世界雜誌並不屬於任何人，凡是愛自由平等，擁護民主的人，都有批評、改進、扶助、培植它的責任和義務。」^⑦在其後發表的〈告讀者〉中更坦承，《民主世界》「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是自由的號角」^⑧。

1943-1946年間，孫科發表一系列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權、鼓吹民主的言論。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化傾向。孫科坦承：1928年國民黨執政後，推行一黨訓政的制度，「有意無意中模仿了法西斯作風」，其具體表現在：(1)「中國是由一黨統治，它的政治、軍事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強有力者，即蔣委員長之手」；(2)「現在的政府非直接由人民選舉出來執行國政的，自1928年執政以來，全國還沒有舉行過普選」；(3)「其他有組織的政治團體，特別是所謂的共產黨未能獲得法律上的存在，視為政府的反對黨」^⑨；(4)「言論不自由」。「不但報紙上的言論很不自由，就是集會演講也沒有自由。」^⑩美國對我們不諒解，甚至懷疑我們，這「對中國的前途是危險不利的」，將使中國在戰後「陷於孤立」^⑪。因此，孫科強調：「中國絕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轍。」^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英美盟國均表示中國「離民主國家陣線日遠」^⑬，更擔心「如果重慶目前的反自由主義傾向繼續下去，中國打敗日本後，很可能出現像法西斯獨裁的東西，……而法西斯的中國，就會變成像日本一樣地危險的國家」^⑭。從1942年起，英、美、蘇三大盟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越來越強烈，有人甚至「公然主張自外方加入壓力」^⑮，迫使國民黨改弦易轍。對此局面，孫科深感憂慮。

第二，指出民主自由是世界政治的主流，中國必須與民主世界同一步趨。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其中心思想仍然是鼓吹「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新專制主義」^⑯。蔣介石不僅通令全國學習，而且「限中央黨政軍各高級官長於本月底以前陳述其研讀《中國之命運》一書之感想」^⑰。國民黨內的自由派人士對此深表不滿。孫科指出：「當今世界政治的思潮是民主自由，而「違反這大潮流的則是法西斯的獨裁專制」。「中國政治離不開世界政治的主流」，中國必須「與民主世界，同一步趨」^⑱。

孫科尖銳地指出：「大凡一個黨，或者政治上的一個勢力，一旦大權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態度，自成了統治階級，便會變成革命的對象。」他提醒國民黨：「不要以為我們的黨有幾十年光榮的革命歷史。過去推翻了滿清，肅清了北洋軍閥，最近七年來領導抗戰，便應該永遠佔據着執政黨的地位，永遠成為中國的統治階級。」並進一步指出：「這種獨尊專制的態度，是當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犧牲，以求其毀滅的。」^⑲因此，孫科大聲呼籲：「現在本黨最要緊的是要實行民權主義，使全國民主化。」^⑳「國際懷疑要實行憲政來祛除。」^㉑

第三，主張以和平、民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反對內戰。如何處理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國民黨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政治課題，孫科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幾經反覆。

抗戰初期，孫科對中共表現得很友好。但隨着國共摩擦升級，孫科也說過一些攻擊中共的話。1943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後，孫科的態度又為之一變。

如前所述，在孫科看來，隨着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國共產黨也就沒有甚麼所謂國際背景，他們進行共產革命，英美資本主義國家一定不贊同，就是蘇聯也不許可。……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不要害怕，共產黨不能消滅國民黨」^②。基於以上樂觀的分析，孫科向國民黨提出了「掃除反共心理」的問題^③。孫科指出：「十年二十年前，世界許多國家，也是同我們一樣，討厭共產黨，害怕共產黨，要消滅共產黨。」這股反共潮流後來「逐漸演變成反民主的潮流」，終於「釀成這次世界大戰」，及至今日，反共已成為過時的東西。孫科指出：「英美現在已沒有反共的宣傳」，「反共老祖宗的意大利，現在亦已放棄反共，且有共產黨加入政府」。「反共不但違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沒有認清自己的環境。」孫科質問道：「我們還有沒有保持『反共』、『防共』的那種作風的必要嗎？」「一面容共，一面反共，這不是矛盾嗎？」^④

針對國民黨內好戰份子「對共產黨非用兵不可，遲早要打」的論調^⑤，他還指出：「打內戰的時機已經過去了，再走回頭路做這個工作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打敗日本以後跟着再來一次長期的內戰，不但人民經不起這種犧牲，試問，國家的前途還成個甚麼樣子？」^⑥他還指出：「即使打起來，國民黨也未必有絕對勝利的把握。」孫科說：「我們在抗戰之後，再沒有力量來進行另外一個國際戰爭。」^⑦中蘇兩國「彼此只應為友，不應為敵」，「老實說，我們也還不是人家的敵手」^⑧。因此，他主張統一團結問題，「必須採取和平政治的方法，決不能用武力、暴力和高壓的手段來求解決」，而「所謂民主的方法，就是用會議的方式，大家開會來商量。所謂民主政治，也就是會議政治。由參加的各方代表，協商討論來達到眾謀僉同的地步」^⑨。

1944年9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作為總統特使來到中國調處國共關係。為此，中共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展開了談判。孫科對此十分關切。12月8日，孫科向蔣介石詢問時局，蔣介石告訴孫科：「聯合政府不能答應，但口頭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憲政可以提早。」^⑩對此回答，孫科很感失望。為打開僵局，孫科於12月16日在憲政實施協進會會議上發表對時局的主張：「國民黨宣言至某月某日國民黨訓政結束，以後由各黨共同訓政，將國防最高委員會開放，讓各黨參加。」^⑪

1945年1月24日，周恩來第二次飛抵重慶，準備代表中共中央向國民政府、國民黨和民主同盟提議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國是會議的預備會議。1月26日，周恩來往訪孫科，兩人就國共談判中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長時間商談。1月28日晚，孫科在其重慶嘉陵新村20號原廬設宴招待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談判代表，並邀各黨派著名人物吳鐵城、邵力子、王世傑、黃炎培、李璜、左舜生、沈鈞儒、章伯鈞等作陪。周恩來在宴會上向大家闡述了中共的主張，孫科則在會上「盛述政府政策錯誤」^⑫，並表示同意以中共的方案作為討論的基礎^⑬。

為了促成這次談判達成協議，孫科主辦的《民主世界》雜誌還發表專文，向國共兩黨發出呼籲：「我們相信國共兩黨必能斷然立下決心，為國、為民、為人、為己，共同作最大的努力，以『政治民主、軍事統一』同時做起，進而完成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建設。」^⑭但由於蔣介石沒有誠意，談判仍然沒有取得進展。2月13日，當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見蔣時，蔣竟以傲慢態度宣稱：「不接受組織

抗戰初期，孫科對中共表現得很友好。但隨着國共摩擦升級，孫科也說過一些攻擊中共的話。1943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後，孫科的態度又為之一變。在孫科看來，隨着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所謂國際背景的」。基於這種樂觀的看法，孫科向國民黨提出了「掃除反共心理」的問題。在他看來，反共已成為過時的東西。

蔣介石堅拒「聯合政府」的要求，以致國共談判陷入僵局。對此，孫科感到十分焦慮。這期間，孫科與中共及民盟緊密配合，為關於「聯合政府」的談判作出了很大努力。為此，國民黨內的強硬派份子指責孫科因「親共」以致「失去立場」，而蔣經國竟攻擊孫科「為虎作倀」。

聯合政府的主張，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⑳對此，周恩來怒不可遏，當即決定結束談判，返回延安。

由於蔣介石堅拒「聯合政府」的要求，以致國共談判陷入僵局。對此，孫科感到十分焦慮。2月15日，孫科接受重慶《新華日報》記者採訪，公開表明了贊同「聯合政府」的態度。孫科說：「聯合政府是遵循民主的方式，在各黨派是參加政府共同負責，加強政府的效能。」「法國以民主的方法迅速解決了內部問題，從而迅速提高了法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也必須用民主的辦法解決內部問題，使中國在戰後得到應有的國際地位」，「法國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㉑。

這期間，孫科與中共及民盟緊密配合，為關於「聯合政府」的談判作出了很大努力。為此，國民黨內的強硬派份子指責孫科因「親共」以致「失去立場」^㉒。而蔣經國竟攻擊孫科等人「為虎作倀」，他說：「此時本黨許多同志不能爭氣，眼看外人詆毀本黨與領袖，而竟袖手旁觀；甚至有少數動搖份子，隨聲附和，推波助瀾，為虎作倀。」^㉓

二 政治協商會議及《五五憲草》爭論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的邀請自延安飛抵重慶談判。孫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這次談判，但他對國共領袖之間直接進行的談判寄予很大希望。在重慶談判期間，《民主世界》雜誌發表〈為團結問題進一言〉的文章，向國共兩黨領袖發出呼籲。文章最後指出：「如果大家都能以萬民之心為心，在朝者以求統一決心而實行民主，在野者以求民主之決心促成統一。試問，有甚麼問題不能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㉔

經過43天的談判鬥爭，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方確認「堅決避免內戰」，「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商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各派代表以及社會賢達協商國事，孫科對此結果深表滿意。11月12日在紀念孫中山誕辰大會上，孫科發表〈和平統一和平建國〉的演講，呼籲各黨派「相忍相諒，相恕相讓」，「在民主方式之下相安相成，而達到和平統一和平建國的目的」。他告誡各方：「不要因爭小我一時的得失，而危及國家民族久遠的前途。」^㉕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孫科作為國民黨代表團首席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1月19日，政協會議憲法草案組討論憲法草案，首由孫科對國民政府提交會議審查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作說明。

《五五憲草》是抗戰前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由孫科主持起草的。從1933年1月開始起草，至1936年5月5日公布，歷時3年又3個月。《五五憲草》表面上是根據孫中山五權憲法的遺教制訂的，規定由國民大會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這四項直接民權。但國家既沒有了行使主權的議會，政府實際亦不向議會負責，這樣的制度是最適宜於個人獨裁的。對那些崇拜英美民主的人來說，《五五憲草》「是一部不三不四的東西」^㉖。因此，《五五憲草》一經提出，立即遭到各方面的強烈批評。重慶《大公報》社評指出^㉗：

時代走向民主，中國必須民主，我們必須制定一部徹頭徹尾的民主憲法。這是根本的國是，絕對不容馬虎。《五五憲草》缺點太多，只可作為參考，不可用為藍本。需要多多聽取人民的意見，需要專家們從頭研究，這問題決不是政治協商會議所能匆匆決定的。

天津《大公報》社評也認為：《五五憲草》的「最大病症是不夠民主」，「《五五憲草》若成為正式的憲法，將是世界上一部最不民主的憲法」^④。

在這種情況下，崇拜英美民主的民盟代表張君勱、羅隆基等人決定利用這個機會，運用英美民主的精神來改造國民黨的《五五憲草》，使之成為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憲法。對此，中共代表也贊同。吳玉章代表中共在憲法審議會上發言時即表示：「英美等先進民主國家所行的國會制度，其經驗很可採取。」^⑤

根據以上思路，政協憲法審議小組綜合各黨各派的意見，最後形成憲草修改原則十二條，其主要內容是：將國民大會由有形化為無形，由公民投票來行使四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其職權相當於各民主國家之議會；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由各省議會及各民族自治區議會選舉之，其職權為行使同意、彈劾及監察權；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省長民選，省得制訂省憲^⑥。

這樣一來，監察院被改造成了英國式的上議院，立法院被改造成了英國式的下議院，行政院則被改造成了「純粹的責任內閣」。行政院長相當於英國的首相，而總統則相當於英國的女王。英國式的議會制和內閣制被整套搬了過來^⑦。

對於憲草修正原則十二條，不僅在野各黨派「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贊成」，中共代表周恩來也「佩服之至」^⑧。孫科作為國民黨的代表，也完全同意此種修改，他稱這是「參考英美推行五權憲法」^⑨。為此，民盟代表梁漱溟特地稱讚孫科：「這種憲草原則在野各方面既完全同意，而尤其難得的是《五五憲草》主持人孫科竟放棄他父親一生奔走號召的五權憲法實質而點頭承認了張君勱的計劃。」^⑩

據梁漱溟分析，孫科之所以同意放棄五權憲法，是因為孫科一直不滿意蔣介石的獨裁。在孫科看來，聯合政府成立後，總統一職非蔣莫屬。於是，孫科便在憲法上做文章，縮小總統在憲法上的職權，實行責任內閣制。這樣，即使將來蔣做了總統，也是位高而無權。據梁漱溟說，孫科還有意出任聯合政府成立後的第一任行政院長。因此，又有「孫科自己想組閣，便出賣了蔣介石」的說法^⑪。

據雷震回憶，本來在「政協開會期間，國民黨出席各小組的代表在會後都要向蔣主席匯報，唯有孫科懶得面蔣報告（國民黨方面出席政協的代表以孫科居首，孫懷鬼胎，不敢面蔣），只把憲草小組會議紀錄送蔣過目，而蔣卻未看。我們屢次請他看，他卻始終未看。到了政協閉幕前夕，蔣才看會議紀錄，已經晚了，來不及挽回了」^⑫。後來，蔣介石也為自己推脫責任說：他於憲草修正原則「事前未能詳閱條文，在協議決定以前，不及向本黨（國民黨）貢獻意見，以相商權」^⑬。

崇拜英美民主的民盟代表張君勱、羅隆基等人決定運用英美民主的精神來改造國民黨的《五五憲草》，最後形成憲草修改原則十二條。對此，在野各黨派「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贊成」，中共代表周恩來也「佩服之至」。據梁漱溟分析，孫科之所以同意放棄五權憲法，是因為孫科一直不滿意蔣介石的獨裁。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通過了「政府改組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案」、「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後，宣布閉幕。

三 擁孫倒蔣失敗，政協憲草遭推翻

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前夕，「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提出了「黨務改革方案」，爭取選舉孫科(圖)為國民黨領袖，罷免蔣介石，以達到改造國民黨的目的，並且已和孫科達成了協議。但不知何故，孫科後來反悔，使擁孫倒蔣從內部改造國民黨的計劃未能實現。

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孫科表示滿意。他主辦的《民主世界》雜誌稱：「協商會議的結果，在原則上可以說與我們的主張不謀而合。」^②2月8日，在張治中主持的慶祝政協會議成功的聯歡晚會上，孫科發表講話，稱「政協的成功使大家歡樂」，他同時批評了國民黨內某些人散布的政協會議「是中共的成功」，卻「是國民黨的失敗」的論調。然而，政協決議卻遭到了國民黨內強硬派的激烈反對。

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前夕，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許寶駒、王昆侖等人的策劃下，由孫科、李濟深、馮玉祥等國民黨民主派出面，邀請國民黨上層人士在重慶民權路聚興誠銀行秘密聚會，到會者有孫科、李濟深、馮玉祥、于右任、覃振、熊克武、龍雲、劉文輝、但懋辛、李任仁、張知本、譚平山、陳銘樞、楊傑、朱蘊山、鄧初民、郭春濤、李世璋、余心清。會上，大家批評

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對蔣介石破壞國內團結、重新發動內戰的陰謀活動表示了極大憤慨，認為國民黨民主派應該為維護國內團結、制止內戰爆發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在會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孫科為該會的「指導員」)提出了「黨務改革方案」，設想以孫科為首，爭取同意該方案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的多數，共同簽名向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提出，選舉孫科為國民黨領袖，罷免蔣介石，以達到改造國民黨的目的，並且已和孫科達成了協議。但不知何故，孫科後來反悔，使擁孫倒蔣從內部改造國民黨的計劃未能實現^③。

1946年3月1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開幕。3月7日，孫科在大會上作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報告。孫科在報告中指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完全是秉着本黨多年來以政治方式解決國事的一貫政策」，會議完全達成了預定的任務。孫科最後指出三點：第一、「在此協議之中，總理的三民主



義、蔣主席的領導建國，已獲得全體一致遵奉與擁護。」第二、「所有的協議，都在不違背革命主義與不動搖國家法統之下，來容納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見。」第三、「我們要變更建國程序，在召開國民大會以前，容納本黨以外人士參加政府，是為了求得和平建國的機會。」⁶⁵

但在全會討論時，與會代表對政協決議「多持異議」⁶⁶，而政協憲草尤為攻擊的焦點。他們認為中國將「因憲法而宣布解體」⁶⁷。他們反對「三權分立和多黨內閣制」，認為這足以造成政局的不安定；他們反對「省得制訂省憲」的規定，認為這將「支解中國為無數獨立國家」，「足以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⁶⁸。國民黨強硬派攻擊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國民黨代表孫科等人，有人甚至說國民黨「被孫科出賣了」⁶⁹！國民黨強硬派還聲稱要撤銷孫科等人的代表資格並加以處分，以致國民黨民主派「栗栗有作『廖仲愷第二』之懼」⁷⁰。

面對強硬派的鼓譟，孫科多次發表談話和文章，試圖維護政協決議。3月10日，孫科在接受《新華日報》記者採訪時，再次肯定政協會議「成就很大」，他批評國民黨內「一部分人的頭腦不行，以為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就是國民黨的失敗。這是沒有遠見的看法」。孫科說：「我始終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是國民黨的成功，也是國家的成功。」

3月15日，孫科又為《民主世界》雜誌自重慶遷往上海出版發表〈新時代的開始〉，再次充分肯定政協會議的偉大意義。孫科指出：「無論從內政上、從外交上，日本的投降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在中國革命建國的過程中，是劃一個新時代。」他又認為「自從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以後，不但國民黨與各黨的關係獲得了解決，中央軍與共產黨軍隊的問題，都已獲得了解決」。當記者問孫科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能否追認通過政協決議時，孫科很自信地回答：「據我看，一定可以的。」⁷¹

然而，時局並沒有按照孫科的設想發展下去。在六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公開號召對政協決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⁷²。3月16日，全會通過《對於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案》，強調「所有對於《五五憲草》之任何修正意見，皆應依照《建國大綱》與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而擬訂」⁷³。五權憲法的基本原則，「絕不容有所違背」⁷⁴。根據這一原則，全會對政協憲草修正原則作出五項修訂，從根本推翻了國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原則。國民黨單方面撕毀政協的決議，理所當然地遭到其他各黨派的強烈反對。中共指出⁷⁵：

政協會議所決定的修改憲草原則，乃是今後中國將繼續是一個獨裁國家或改革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根本關鍵，因此是中國民主派與法西斯派政治鬥爭的焦點。如果這些原則被推翻，則政協會議的其他決議，政府的改組、國大的召集乃至停戰、整軍等等協定，都將成為具文，都將為法西斯派在獨裁政府中撕得粉碎。

國民黨推翻政協決議，不單標誌着孫科自1943年來爭取民主努力的失敗，也標誌着此期間的整個憲政運動的終結！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否決了政協憲草修正方案，並通過「所有對於《五五憲草》之任何修正意見，皆應依照《建國大綱》與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而擬訂」的方針。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國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原則。國民黨單方面撕毀政協的決議，標誌着孫科自1943年來爭取民主努力的失敗和憲政運動的終結！

四 從鼓吹民主到鼓吹內戰

孫科鼓吹民主，並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為他本人贏得了很高的聲譽。海外華僑及美國新聞界非常重視孫科的言論，他的鼓吹民主的著作被美國許多報刊爭相評論介紹，「備受推崇」。美國報刊甚至稱孫科為「中國與中國國民黨復興的曙光」^⑥。孫科的支持者則稱頌他是「民主的先進，進步的象徵，國際問題權威，制憲的領導者」^⑦。

1947年春，國民政府醞釀改組。胡適致函傅斯年，極力推崇孫科為閣揆的最佳人選^⑧。在胡適、傅斯年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看來，國民黨內著名的自由派領袖孫科、王世傑為組閣的最佳人選，這可說是惺惺相惜。不過，蔣介石卻煩透了孫科，根本不可能將握有實權的行政院長職務交給他。蔣介石最終選擇了他的把兄弟張群擔任行政院長。但為安撫孫科，蔣介石也提名他擔任名義崇高但無實權的國民政府副主席。

1947年6月，國共關係破裂，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孫科基於與國民黨的深厚歷史淵源，最終還是選擇了與國民黨政權共沉浮的道路。

從1947年6月20日起，孫科在「事前未與政府任何人商談」的情況下^⑨，以國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向國內外記者發表一系列談話，無端指責蘇聯和中共，露骨地乞求美國援助國民黨打內戰。孫科還揚言：「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⑩7月14日，國民政府下達所謂「戡亂總動員令」後，孫科積極予以支持，並稱：「我們戡亂必須下最大決心，而戡亂必須徹底，否則國家不能保，民族也會死亡！」^⑪

孫科由原初鼓吹民主轉而鼓吹戰爭，並將自己綁到蔣介石的「戡亂」戰車上。這樣，孫科「由政治解決起家，而今成為內戰舐血者」^⑫。

自從孫科與蔣介石合流，並接連發表反共反蘇，乞求美國援助的談話後，「國人對渠（指孫科）觀感，突然一變。由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首先發動，對孫氏猛施抨擊，從此聲望與往昔不可相比」^⑬。

1948年12月25日，毛澤東以中共權威人士名義宣布43名中國內戰罪犯名單，孫科榜上有名，名列第13位。毛澤東解釋說^⑭：

孫科之所以成為戰犯，是因為他一向贊助蔣介石發動戰爭，並堅持戰爭。直到1947年6月22日他還說：「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他就是國民黨內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

1949年，國民黨政權面臨全面崩潰的局面。孫科在大陸已無立足之地，決定前往台灣落腳。然而，當他踏上台灣後，他很快就發現，在蔣氏父子清一色勢力控制的台灣，像他這樣的自由派份子已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孫科不得不離開台灣，前往澳門，1951年前往法國，1952年移居美國，成為政治難民。直到60年代，蔣氏父子在台灣統治已相當穩固，蔣介石才允許孫科回到台灣歸隊。1965年10月29日，孫科以參加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紀念為名，自美國回

從1947年6月20日起，孫科向國內外記者發表一系列談話，無端指責蘇聯和中共，露骨地乞求美國援助國民黨打內戰。這樣，孫科由原初鼓吹民主轉而鼓吹戰爭，並將自己綁到蔣介石的「戡亂」戰車上。自從孫科與蔣介石合流，「國人對渠觀感，突然一變。由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首先發動，對孫氏猛施抨擊，從此聲望與往昔不可相比」。

到台北定居。次年6月16日，蔣提名孫科出任台灣當局的「考試院」院長。孫科原本沒有出山的意願，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蔣的提名。孫科後來解釋說^⑮：

回國以前，自忖年事已高，本想不再從政，但因總統之命，不敢不遵；而今日反攻復國大業，凡為國民，皆有責任。接長考院，亦所以盡棉薄，贖前愆，故未便謙辭，毅然受命。

在孫科看來，他於抗戰勝利前後鼓吹民主、參與民主運動倒成了無可饒恕的「前愆」，這真是歷史開了他的一個玩笑！不單如此，我們從他一生的經歷，也可以看見中國憲政發展的崎途。

註釋

①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抗日戰爭時期（下）》，頁411。

② 周一志：〈「非常會議」前後〉，載《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98。

③ 〈中國近況〉，載《盟邦人士的諍言》（延安：新華書店，1944）。

④⑤⑥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1943年5月24日；1943年5月24日；1947年6月21日。

⑦ 董必武：〈大後方的一般概況〉，載《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情況資料》（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翻印）。

⑧ 〈編者的話〉，《民主世界》（重慶），創刊號，1944年5月5日。

⑨ 〈告讀者〉，《民主世界》，第2卷第8、9期合刊，1945年5月1日。

⑩ 孫科：〈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前途〉，載《三民主義新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⑪⑫⑬ 孫科：〈怎樣促進民主〉，同註⑩書。

⑭⑮ 孫科：《政治民主化、經濟計劃化》。

⑯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944年4月3日；1943年1月27日。

⑰ 格爾德：〈關於中國的近況〉，載註⑩書。

⑱⑲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待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頁523；476。

⑳ 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解放日報》（延安），1943年7月21日。

㉑ 轉引自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595。

㉒⑳ 孫科：〈說左右〉，同註⑩書。

㉓㉔㉕㉖㉗ 孫科：〈怎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同註⑩書。

㉘㉙ 孫科：〈世界潮流和我們的作風〉，同註⑩書。

㉚ 孫科：〈世界大勢與中國前途〉，《民主世界》，第2卷第13、14期合刊，1945年9月。

㉛⑳ 《黃炎培日記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1944年12月26日；1945年1月28日。

㉜㉝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599；602。

㉞ 轉引自鍾天心：〈為團結問題進一言〉，《民主世界》，第2卷第13、14期合刊，1945年9月。

- ③⑥ 〈孫院長昨發表談話〉，《新華日報》(重慶)，1945年2月16日。
- ③⑦ 《徐永昌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44年9月27日。
- ③⑧ 蔣經國：《我的父親》(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頁75。
- ③⑨ 鍾天心：〈為團結問題進一言〉，《民主世界》，第2卷第13、14期合刊，1945年9月。
- ④⑩ 孫科：〈和平統一和平建國〉，載《孫哲生先生文集》，第3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
- ④⑪④②④③④④⑤④⑥④⑦④⑧④⑨⑤⑩ 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編：《政協商會議紀實》，上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頁722；421-22；482-84；722-23；732；732-33；733；733。
- ④⑫ 〈綱領·政府·國大·憲草〉，《大公報》(重慶)，1946年1月21日。
- ④⑬ 〈論憲草審議五五憲草不宜作為藍本〉，《大公報》(天津)，1946年2月26日。
- ④⑭ 孫科：〈政治協商會議各分組委員會商談情形〉，載《孫哲生先生文集》，第4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
- ④⑮ 〈對於憲法草案之提示〉，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487。
- ④⑯ 鍾天心：〈理智的抉擇〉，《民主世界》，第3卷第2期，1946年5月16日。
- ④⑰ 王德夫等編寫：《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歷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45。
- ④⑱ 孫科：〈有關政治協商會議之報告〉，同註④⑩書。
- ④⑲ 《新華日報》，1946年3月12日，「社論」。
- ④⑳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日，「社論」。
- ㉑⑳ 《新華日報》，1946年3月10日，「社論」。
- ㉒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頁221。
- ㉓ 《新華日報》，1946年3月11日。
- ㉔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1日。
- ㉕㉖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1048；1048。
- ㉗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解放日報》(延安)，1946年3月19日，「社論」。
- ㉘ 潘楚基：〈從羅斯福當選看美國和中國〉，《民主世界》，第2卷第4、5期合刊，1945年3月1日。
- ㉙㉚ 李家駿：《第一任副總統李宗仁先生傳》(上海：吼聲書局，1948)，頁33；33。
- ㉛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頁175-76。
- ㉜ 孫科：〈論世界之危機〉，同註④⑩書。
- ㉝ 孫科：〈為競選副總統招待冀魯平津青島國大代表講演詞〉，同註④⑩書。
- ㉞ 〈總動員與總崩潰〉，《人民日報》(晉冀魯豫)，1947年7月16日。
- ㉟ 毛澤東：〈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312。
- ㊱ 孫科：〈八十述略下〉，《傳記文學》(台北)，第23卷第6期，1973年12月，頁65。